

最无争议之“国学大师”：章太炎

刘 墨 著

史学研究之前驱：夏曾佑

“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的清学史研究

疑古主将：钱玄同

独 为 神 州 惜 大 儒

现代国学思潮与人物

“最是人间留不住”：王国维自沉的前前后后

“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的学术思想

团结出版社

獨為神州惜大儒



現代國學思潮與人物

劉墨著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为神州惜大儒:现代国学思潮与人物/刘墨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214-932-8

I.独… II.刘… III.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217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装订: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170×230 (毫米) 1/16

印张: 21.625

字数: 198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14-932-8/K·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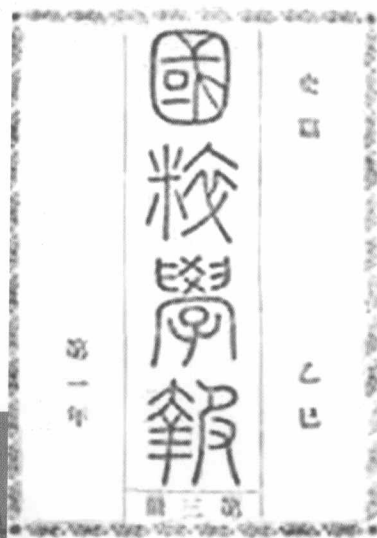
定价: 38.0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国学保存会合影

国粹学报



清华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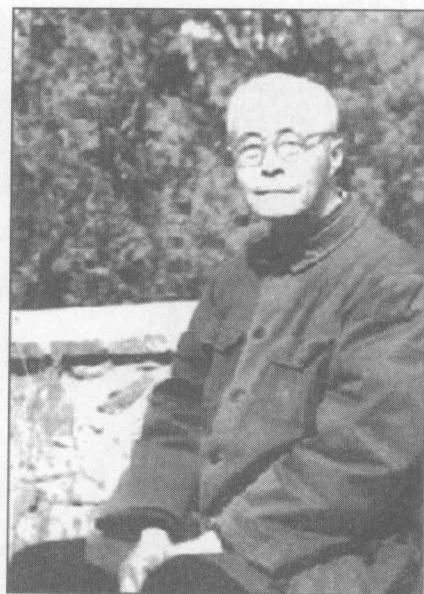
国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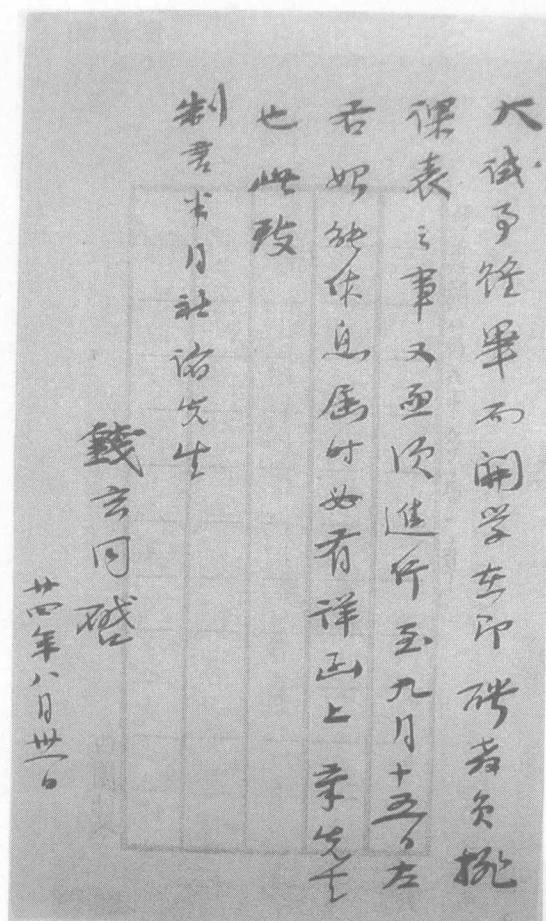
梁启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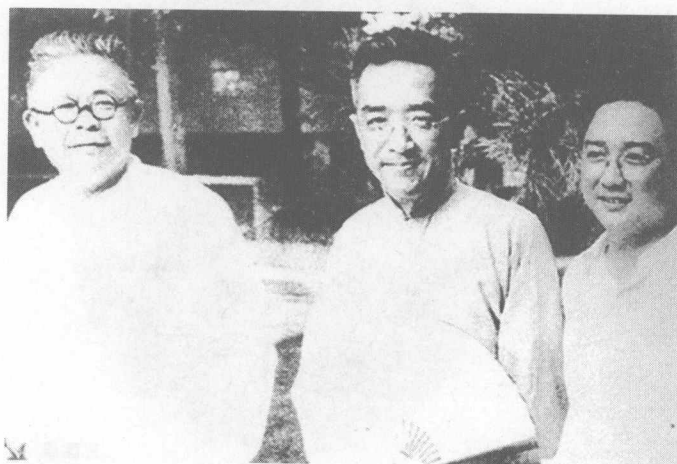
章太炎



顾颉刚



钱玄同墨迹



胡适与他的同事



王国维与罗振玉

癸卯秋九月四日年石見歲終時局之變千幻百
 流衣何可言黃門以言事伏誅學士以黨人棄
 綢一而性節相鐵莊也唐書中詳之多不項
 德南比兩局一懷于小人一懷于君子舉未數月
 已成前塵此自中國氣運之變何之哉此間雖已渡
 而於唐之變賴賢者著之肝膽之地不復可以
 居也
 先生處敵報派甚美此書

梁启超手迹



王国维



陈寅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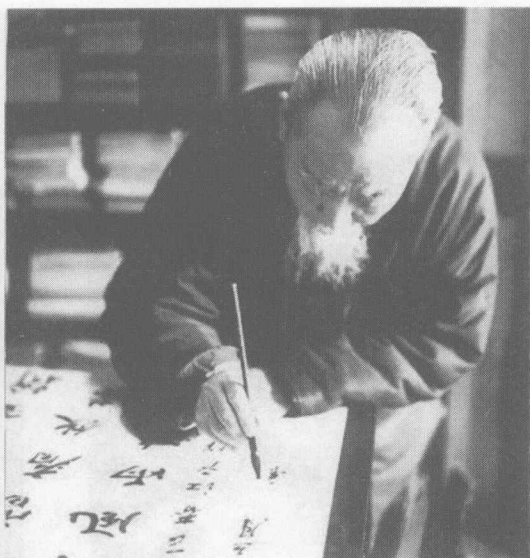


王国维

清华国学院教师，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傅斯年



陈垣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
剛忘了
昨兒的夢
又分明看見夢
裏的一笑
新詩 胡適



廿三五

胡适新诗

自序

进入 21 世纪，“国学”似乎非常“热”了，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在一些大学纷纷设立，社会上的各类国学班、机构会所与相关杂志、网络资源也层出不穷，人们已经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对国学“深恶痛绝”，而是津津乐道，其热度足以引起学界一些人士的担忧，认为国学热并不一定是好事。这样的争论各有其立场，也各有其用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幸的是，人们对于国学或传统文化已经不再恫惶诅咒，也不再背叛绝望，“文革”期间唯恐摧烧不尽的国学典籍又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案头。

本该值得庆幸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学”就一定会兴旺，“国学家”就一定会自动产生。我私下以为，21 世纪的国学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的知识问题，而是隐含在知识背后的学术精神问题。也就是说，新的国学家面对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克服依傍西学建立起来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与学科基础理论合法性问题，以及解决学科制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在这之后，才能真正走向整理国故之途。

为何有此说？

从 1919 年新文化运动算起，近百年来的反传统思潮、政治运动的洗刷、意识形态的注入，虽然种性、地理、方言未变，但今天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传统之外的另一个中国，变成一群现代中国人，伴随国学而来的品性教养和渊博学识，即国学的“真身”和“血脉”，似乎已经遗失殆尽。

我们现在已经普遍接受并视其具有“合法性”的学科名词，如“史学”、“哲学”、“艺术”等等，这些词汇原本不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之内，不过百年前刚刚被“制造”出来而已，要真正找到整理国故之途，必须首先注意到这一点。

“国学”是什么？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可以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1936年，章太炎去世；1962年，胡适去世；1967年，马一浮去世；1969年，陈寅恪去世；1980年，顾颉刚去世；钱穆与冯友兰则于1990年先后离去；1998年，钱钟书去世——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罗列已经足以说明，我们心目中的现代学术大师，已经离我们有多远！到今天，学术是进步、退步或尚有待评定，但无论如何，从“国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已与过去的学人相隔整整一个世纪。

“国学”是什么？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可以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这样的争论，即使已经持续了80年，像“‘国学’应该包括哪些学问”这样的基本问题仍在困扰新一代的学者。为“国学”范畴争论不休的学者，往往忽略晚清民初中国传统学术在向现代学术转变的过程，即从四部之学（经、史、子、集）向七科之学（理、工、农、医、文、法、商）转换的历史语境中，把经、史、子、集切割为文、史、哲——大框架虽可相容，但精神血脉，却已极不相同。

以《四库全书》作为衡量标准，传统学术被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传统学术应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以现代学科分，中国传统学术分别被划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学、民俗学、艺术学、目录版本学等。因为当传统的“四部之学”转为现代的“七科之学”以后，经、史、子、集就分别变成了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文学、中国民俗学、中国语言学、儒家哲学、美学等等，再加上大量的翻译术语在内，今人在阐述国学时一方面以现代学科意识切割传统，同时也仿佛进入了学术的迷宫——传统学术的巍峨大厦随之轰然倒塌，其零砖碎瓦被用来组合到新的学术之中。

国粹派的领袖人物邓实称：“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类似的定义在那个时代的论述中

比比皆是。所以“国学”实际上正是一种“民族国家之学”，而它刚好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同步，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专门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国学”，同样也是“现代知识”！

酒井直树曾经指出：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种时间顺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秩序从来都是同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秩序基本上是19世纪的历史框架，人们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种族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前现代”和“现代”的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配对组合却早已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的组织手段之一。^①

无疑，这种“现代性”的“话语装置”，正是这样渗透在每一种学科里的。

用这样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历史乃至现代学术，能有效地提醒我们注意到“国学”的确立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同时，我并不要或者也无能力拆解这个“话语装置”，但却不能不觉察到其中所出现的问题。

提倡或固守“国粹”，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就在《劝学篇》中强调：

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②

除“史学”、“哲学”、“艺术”等这样的概念外，我们也接受了“国家”、“民族”、“国学”这些我们如今司空见惯的概念，然而事实上这些概念统统非中国固有，而是在近百年前西学传入后才被构建起来，“国学”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它们以及自身。由于这些概念虽产生只不过百年却如此根深蒂固，“国学”的清理还任重道远。

^① 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号。

^② 《张文襄全集》，第四册第546页。

大家以为用“中体西用”这种方式就能将西学和中学很好地融合，但实际上当时“用”更为迫切，如此以来，“中学”就在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摆设。

“国学”，正是在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和学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如此，是他认为三件事实际上只是一件事：“保国、保种、保教，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不过，他这里所说的“教”是孔孟之道，而“国”则是朝廷，这恰是国粹学派以及章太炎等人所极力反对的。

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晚清时期被认为是调和中、西学术的最佳方法，但却在“体”与“用”的分别下将中学与西学分作两途——在“用”的前提下，西学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经学、理学、诸子学，不过是“以中学固其根柢”这一门面语的摆设而已。但当我们以前述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时，“中”、“西”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就会被搁置一边，而把人们一贯认为的分属于传统的“中国学术”和分属于现代的“西方学术”无不看作是现代知识框架中的共同组成部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当钱穆着手写作《国学概论》一书时，他在《弁言》中却首先强调，因学术本无国界，所以“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恐亦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而且他还特别强调：“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可者则否，实难判别。”可以称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发出如此感慨，并非无由。无疑，即使是自学成才的钱穆，也已经不能不习惯于在学科体制之下来思考“国学”问题了，遑论其他！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国学”这一名目在学科的含义上是否具有“合法性”都让人困惑，而“国学”接下来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目标也不像别的学科那么明确。

钱穆提到学术本无“国界”，已经意识到“现代国家”与“学术”之间的问题。当然，这样的问题，还是身处“后现代”的我们看得更清楚——“国学”，正是在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和学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也是在此意义上，钱穆才会强调，“国学”既没有来源，也未必会有未来。

所以在我看来，目前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工作在于，我们应该

知道“国学”的产生与发展。甚至我们还要追问：“国学”真的会像钱穆所说的没有未来吗？

如果我们稍微用心考察一下“国学”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国学”有着非常清楚的历史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声音围绕着“国学”，并从不同的角度界定着和质疑着“国学”。

当然，在这一探究的过程中，例如章太炎、王国维等国学家的个人魅力更引人入胜，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国学”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来理解“国学”，以及“国学”如何定义自身并由此进入知识化之生产等等问题，显然更有学术价值。换言之，“国学”在一开初虽然遭到了种种质疑，但它仍然出现在学术界甚至现代大学之中，正表明“国学”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着相当内在而深刻的关联！我想，提出以上问题，正是研究“国学”赖以成立的基础。

我们如果顺着时间的脉络，将视角逐步地追寻“国学”一词的构建历程时，就会发现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根本不是自然的产物，它是在“现代”这一意识的引导下，通过社会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观念的与制度的力量塑造出来的。所以我才会在这本书中，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学”是如何被历史地构建起来的？

——人们如何通过社会的变化来理解“国学”？

——“国学”如何在现代大学体制中、学术研究机构中、教育课程的设置中完成自我生产，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如何面对自我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每一个问题的成功解答，无疑都可能把上述诸种问题引向深入和明确。说其深入，是因为我们不会再停留在“国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这样的简单问答上；说其复杂，是可以说明“国学”在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中所发生的细微的变化，并且弄清“国学”在不同

我们很少去质问现代性知识的合法性以及前提，现代性知识一定等于真理吗？它的前提是否真的那么毋庸置疑？

辈份的学者间产生的理解与差异。很显然，作为现代知识之一部分的“国学”，并不是自明的和固定不变的，关键是能够在这样的清理过程中发现成为现代学科一部分的“国学”中所潜藏的个人经验以及这种经验所揭示出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态度。

关于“现代性知识”究竟如何，目前已经是人文学科中一个反思的主要问题。中国传统学术所以在近百年成为“国学”，而且在人们达成共识的同时也赋予其“合法性”，也是因为“现代性”也深刻地介入其中的缘故。换句话说，“国学”是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国现代性问题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最著名的例子，就应该属胡适所提倡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一说，这无疑是胡适学术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但恰恰是这门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为主体的学问，却充满了“现代性”。当然，在潜在意识里，这一“现代性”还体现为对西方的“抗争”。^①

另外，我写本书的目的还在于意识到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内大规模地移植西方学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的学术类型和文化类型被当作普遍形态以及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化的典范。这种情况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的影响究竟如何，还没有得到更好的梳理，它的复杂性也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我们固然在学习西方人文学术和借鉴西方人文学术方面建立了学科制度和教育制度，并产生了学术成果和造就了专业人才。但不能不看到，由于我们失去了

^① 从学理的角度上说，正如竹内好以鲁迅为例所说的，19世纪后期欧洲的现代性扩张至全世界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的分裂，分裂的结果是从欧洲内部迸裂出三个既对立又欧洲又彼此相互对立的世界，第一种是俄国的反抗，第二种是美国的独立，第三种便是东方的抵抗，“似乎正是由于东方的不断抵抗，欧洲性在传播到东方的同时，逐渐产生了超越它的非欧洲性的东西”。文见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霍颖译，收入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中。具体到国学中，则是傅斯年“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一说，具体可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十一章《近代学术传承：从国学到东方学》，第275页。

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失去了中国固有的人文学术支撑，从而使中国人文学术在最大程度上失去了依据自己的资源和针对本土经验不断创生新的学术思想、文化理论的生命活力。

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学术”乃至“当代学术”的现状。

本书的核心，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但是却未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即“国学”是如何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现实等等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然后在争论不休中经历怎样的历程。

把不同文化传统不按历史时间任意地放在一起，有意阐明其间的生与死、落后与先进，原是西来的思路，20世纪初期那些决意切断文化传统的人，与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及至整个国家的革命贯串在一起已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者们，是血气方刚的革命者对千年旧传统施以诅咒；20世纪80年代的反传统者们，是隔代晚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背弃与绝望。面对空前的文化断层与历史遗患，21世纪的“国学”研究，还会顺着胡适或鲁迅等人的思路前行吗？

刘 墨

2008年10月6日于藤石昌寿山房

本书的核心，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但是却未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即“国学”是如何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现实等等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然后在争论不休中经历怎样的历程。

目 录

CONTENTS

1	自 序
1	第一章 西学传人与学术分科
17	第二章 从“国粹”到“国故”
33	第三章 “古学复兴”
41	第四章 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及其影响
63	第五章 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
75	第六章 “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的清学史研究
87	第七章 疑古主将钱玄同
99	第八章 “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
131	第九章 顾颉刚的疑古史学
145	第十章 梁启超与胡适的国学书目
163	第十一章 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学术交谊
175	第十二章 王国维与乾嘉学术
187	第十三章 王国维自沉的前前后后
207	第十四章 清华国学研究院
241	第十五章 “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个新阐释
267	第十六章 陈寅恪致陈垣信札考释
285	第十七章 傅斯年对国学的态度
299	第十八章 “新文化史”：艾尔曼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311	第十九章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史学